

# 泰戈尔访问清华园 呼吁同学要知道肩负的责任

“吾人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，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，不禁心旷神怡，觉天下事无小事，天下物无物不美矣。”这是1924年清华学生在清华园亲炙泰戈尔的感受。抒情的语调不免夸张，但能反映出一代诗哲对清华学子的震撼。

1923年，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开以后，清华同学以“望穿眼”来表达其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。

1924年4月29日下午，泰戈尔与徐志摩等赶赴清华。在休息了一天，5月1日晚8点半，泰戈尔在大礼堂对清华师生发表演说，徐志摩担任翻译。这次演讲事先没有预备，诗人是凭借自己敏捷的才思、真挚的情感，珠玑般的妙语如长江大河源源不断。

演讲中，泰戈尔呼吁清华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：“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，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。这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。”他劝告清华同学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，不要被物质主义的



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，左起张彭春、徐志摩、张歆海、泰戈尔、曹云祥、辜鸿铭、王文显。

毒素玷污了纯洁的灵魂。希望清华同学“努力去建设一个世界的文化。”

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，尽管仍坚持批判物质文明，宣扬精神文明，但语气相对此前历次演讲，已大为缓和，并且语气多了一份惆怅与无奈。泰戈尔甚至伤感地说：“我是倦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，这也许是我们最

后的一次集会。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，不要惶惑。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……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，你们一切的工作，一切的行动，都应得折中于那惟一的标准。”

在清华期间，泰戈尔还接受了清华同学的采访。清华同学十分珍惜直接聆听大师教诲的机会，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哲风采，还就“西洋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，应常何样解决。”“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？”“对人猿同祖说的真假有何见解？”“对基督教中所谓罪恶有何主义？”等社会、人生问题，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。

清华之行，不但让年老疲惫的泰戈尔得到良好的休息。与清华师生宽松自由的交流，也使诗人精神极为愉快。徐志摩观察到：泰戈尔与学生们“谈论人生问题——自宗教至性恋，自性恋至财政，不仅听着的人实惠，讲的人不受形式拘束也着实愉快。”“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

与学生的谈话是很投机的。”

英文教师王文显形容泰戈尔“其状高髯，其发灰白，其体从容而尊严，其音和平而甜美，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。”历史教师陆懋德认为“泰氏实有一种感人态度。令人一见而知性情之冲淡，胸怀之坦白，心地之光明，人格之高尚。”同学们反映“太氏温蔼可亲，且善为青年劝导。”称赞泰戈尔清华之行“实在是我们最引为荣幸，并且在清华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。”泰戈尔让学生心潮澎湃，“是因为他带了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。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那伟大的人格。”

泰戈尔回国后，1925年在加尔各答将在华演讲集出版，题为《在中国的谈话》，其中第三部分“与学生的谈话”主要是他在清华的讲演，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、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。清华园之行，也成为这次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浓重的一笔。

人民网2016.10.27文/金富军

## 方志敏与国民党法官的第一次交锋

1935年1月27日，方志敏不幸被俘，不久，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南昌，关押在军法处看守所。一天晚饭后，方志敏突然被提审。由于他戴着脚镣，行走不便，最后被看守背上了法庭。这是方志敏第一次与法官面对面的交锋。

落座之后，主审法官便用关怀的语气“透露”了方志敏夫人缪敏“带兵的消息”。

1934年10月，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。那时其妻缪敏怀有身孕，不便随军行动，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战争。此后到方志敏被捕，两人没有联系过。方志敏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，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。”

“你的夫人不能带兵吗？也许他们拿你夫人的名字号召一下也难说的。”

但方志敏再次肯定地说：“我决不哄你，她是一定不能带兵，同时，她的政治地位并不高，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，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。”

法官立即转换了话题：“你是不是

想见一见你的夫人？你们的爱情可好？有几个孩子？”

方志敏告诉他：“我共有5个孩子，都很小，我与我妻的感情很好，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。”

法官说：“那倒不必，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，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？”

方志敏反问：“找她来，做什么？”

“找她来，当然有益于你，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。”

方志敏严词拒绝：“不行，况且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。”

法官马上建议：“你如果愿意写信，地方总是可以找到的。这次不是捉了几十名你们的人吗？你可以在他们之中挑一个可靠的送信。”

方志敏只是回答法官可以“想想”。

此后法官先是劝说方志敏“到国方来做事”，遭到拒绝后又挑起了一场关

于信仰的“辩论”。当听到方志敏说共产党员“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”时，法官污蔑共产党员“大部分不过是盲从”，遭到方志敏驳斥后，敌人又改口说共产主义在中国“即使能成功，恐怕也得五百年，就算不要五百年，顶快顶快也得要二百年”，还规劝方志敏“为什么要做傻子，为几百年后的事情去拼命呢”，更大谈“随风转舵，是做人必要的本领”，又把叛徒孔荷宠搬出来说事，说孔现在成了少将，“每月有五百元”。

方志敏则告诉法官：“朝三暮四，没有气节的人，我是不能做的。”“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。”

法官见状，使出看家本领，威胁方志敏“枪一响，人就完了”。方志敏则坦然回答：“我完全知道这个结局！但既然不能两全，我只有选择一死。”

法官黔驴技穷，只好悻悻地令看守将方志敏背回牢房。

《人民政协网》2016.11.3文/刘明钢

沃尔特·达姆罗施，美国著名指挥家、作曲家，20多岁时就已经是知名的乐队指挥。功成名就的他没有狂妄自大，依然保持低调谦逊的作风，赢得了一片喝彩。

## 借我一根指挥棒

沃尔特·达姆罗施刚当上指挥的时候，曾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比别人技高一筹，经常会夸夸其谈、自以为是。有一天，他们在排练一个重要的演出节目，由于走得太匆忙，他把最重要的指挥棒忘在了家里。正当他准备派人回家去取时，秘书却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向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。”沃尔特·达姆罗施十分诧异：指挥就我一人，乐队其他人怎么会带上指挥棒？秘书看到沃尔特·达姆罗施疑惑的表情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除了你之外，乐队的其他人都有可能带上指挥棒！”沃尔特·达姆罗施疑惑地向乐队问了一句：“有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？”话音未落，乐队的人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根指挥棒。

沃尔特·达姆罗施一下子惊出了一身冷汗：原来，我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人物！

《知识窗》2016年第9期文/崔子荣

## 梅兰芳的代笔画

张伯驹在《梅兰芳画梅》一文中，公开了梅兰芳的代笔：“梅兰芳晚华画梅，因人求者甚多，无暇应接，而又不愿开罪于人，遂倩代笔者为之。在己卯岁（卢沟桥事变后）晚华居香港以前，为汤定之涤代。汤画有文人气，殊雅致。晚华后归京，而定之于戊子岁歿，则由汪澂士代。汪虽专画梅者，而韵则不及定之。后汪亦歿，不知代者为谁？更不及汪。”

说的有模有样，甚至来龙去脉都说的非常清楚，说明代笔画并非需要掩人耳目，遮遮掩掩，可以说是半公开的游戏吧。无独有偶，民国时期的老报人包天笑，在其《钏影楼回忆录》中，也写了梅兰芳的代笔画，这次是他的亲身经历。

包天笑脱离《时报》后，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居住。因梅兰芳是他的故交，来上海时，曾送给他一幅扇面，画的是花卉，落的是梅兰芳的款，因为扇面的另一面是空白，于是包天笑乘这次来北京的机会，请梅兰芳在空白处，再题一幅字。但见到了梅兰芳后，梅坦率地说：上次来上海，大家商量下来还是送大家扇面比较好，所以请人画了十几幅，赠送给上海的朋友，我不敢欺骗您，过两天我再亲自画一幅给您。

这一席话，说的包天笑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为梅兰芳的诚实而感动。

《北京青年报》2016.11.2文/老钱

## 追随梦想，总是在路上

1979年，15岁的我怀着梦想与激情，离开故乡浙江余姚，前往京城求学。在大学里，我年龄最小，思想也很单纯，多得同学照顾帮助，跟大家相处很好。

大学毕业后，学化学的我被分配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。跨行就业逼着我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习影视创作，从理论到实践，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平和能力。当时单位里业务氛围极好，年长同事言传身教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很快地，我和同事接到一个任务，到西北去拍摄一部军事地理片。

这是一部只有几个小时的片子，但是我们却花了两年时间来精心拍摄和制作，其中90%的航拍内容是我导演拍摄的。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，因为地处高原，食物煮不熟，吃不习惯；另外，高原反应对人身体的影响也很大。从西北回到北京，我的体重从64公斤降到了48.5公斤。什么是工作的艰辛和重要性？什么是生活的困难？年轻的我在茫茫西北大漠里找到了答案。然而，我觉得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辛，永远无法与工作的重要性相提并论，也无法与自身素质能力提升相提并论。

在西北工作期间，我和同事碰到了多起汽车翻车事故，摄制组甚至还遭遇了飞机失事的悲剧。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上，翻车出事或者汽车缺油时，往往

看不到一个人，找不到任何救助。惟一能做的就是等。那时，从车上下下来，举目四顾，天是圆的，地是圆的，人就显得极为渺小。所以，我常常思索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人是这么的渺小，那一个人所遇到的事情还会有多大呢？西北之行给了我一次心灵与素质的历练，让我从一个毛头小伙蜕变成有思想有目标的成熟导演。

为农服务拍精品，致力于农业类和健康类的科教影视创作，是我参加工作后为自己定下的第一个梦想。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有了了一定的资源，就应该为基层多做一点事。我第一部获国家级大奖的影片是《现代农业技术植物化学调控》。为了拍摄这部片子，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先后在浙江、北京、山西三地奔走。1995年，我受命出任北京科影音像出版社副社长。为了更好地服务“三农”，我决定沉下心来做科教电影，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。

1997年，我策划执导了一部名为《暖棚养畜》的电影。这部影片详细介绍了暖棚养畜这种低投资、高产出的饲养新技术，教会广大牧民用最简单的办法搭暖棚，用最简单的办法管暖棚，使他们用较低的成本得到较好的饲养效果。影片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。一年后，我又策划执导了后来获得多个大奖的影片《征服病毒病》。

但是，2001年又执导了三部农村科



谢九如：中央新影集团总裁助理、副总编辑，北京科影音像出版社社长，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副理事长，国家一级导演。

教影片、静下心来反省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文学功底拖了影视创作的“后腿”，导致这三部影片的质量相对于以前的作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。为此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发展之路：第一是花三年时间沉下心来认真“恶补”文学类知识，切实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；第二是脱离创作一线，转为从事创作管理；第三是打造全国专业科技类音像出版行业的佼佼者，努力去实现“城乡资源共享梦”。最终，我选择了第三条路，并一直坚持到今天。

我想，一个人做事格局一定要高，眼界也要高；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，站在科教影视产业的最前沿。这样放眼一看，视野又更开阔了。

追随梦想，总是在路上。

《人才》文/谢九如